

# 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張懋鎔

## 一、族屬問題

近來，隨着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資料的陸續披露，〔1〕關於西周曾國的族屬問題再次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2〕先前關於曾國的族屬就有姬姓與非姬姓兩種不同的看法。這次曾國多座墓葬的發掘，內涵比較複雜，由於其中的 M1“棺底有一橢圓形腰坑”，“坑內殉一狗”，並出土“師作父癸”方鼎、“師作父乙”圓鼎等日名銅器，遂使族屬問題更加撲朔迷離。李學勤先生堅持他的一貫主張，西周曾國是姬姓；曾國墓地的主要發掘者黃鳳春等先生也力主墓地主人是姬姓；李伯謙、張昌平等先生根據姬姓周人不以日干命名的說法，斷言“包括曾侯在內的此墓地的墓主人決非姬姓”；朱鳳瀚先生則以為“僅從葉家山墓地已出土的青銅器之銘文看，尚不能確證此曾侯屬姬姓”。

承蒙諸位專家引用“周人不用日名說”為證，我不勝榮幸，也不勝惶恐。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以及一些演講場合中強調，希望能全面理解與引用“周人不用日名說”。〔3〕對於像葉家山這樣內涵複雜的西周墓地，如何來推定它的族屬，我想首先還不是看出土銅器上有無日名或族徽，而是遵循考古學的基本原則，從墓葬形制入手。大致應該

---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第4—60頁。黃鳳春等：《湖北隨州葉家山新出西周曾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11年第11期，第78—86頁。

〔2〕《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第64—77頁。以下關於諸位專家對族屬的意見，均出於本文，不再一一註明。

〔3〕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文博》2009年第3期；《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第23—25頁，科學出版社2010年。

有幾個標準：

第一，對於成片的商周家族墓地而言，不能由其中一座墓或少數幾座墓葬顯示的某些文化因素（如有腰坑或殉人）來定，判斷其為商遺民墓地、非姬姓家族墓地。應綜合考察墓葬形制。

在殷墟，大部分墓葬有腰坑，腰坑應該是商人的葬制。與此相反，近年來在岐山縣周公廟附近發現大量墓葬，無論是大型墓，還是中小型墓，墓葬中無一例外地不見腰坑。關於周公廟墓地的性質，雖然學術界有周王陵、周公家族墓地等不同的看法，但一致認為它是周人的墓地。顯然周人是不用腰坑的。從有無腰坑去判別殷遺民與姬周貴族的墓葬，誠然是個不錯的辦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這麼簡單。例如陝西寶雞茹家莊 1 號墓乙室中也有腰坑，殉葬一犬，〔1〕但並沒有學者認為茹家莊墓地是商遺民墓地。再譬如在山西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M114 殉葬一人，〔2〕但也沒有學者否認這是姬姓國君的墓葬。雖然葉家山 1 號墓也有腰坑，殉葬一犬，但在已發掘的幾座較大的墓葬中，只有這一座墓有腰坑，其他墓葬如 M65、M2、M27 均沒有腰坑與殉犬，因此不足以否定曾國為姬姓的事實。

葉家山 1 號墓在腰坑與殉犬方面雖然不同於其他墓葬，但是它與 M2、M27“自北向南大致排列在一條綫上”，它與 M65、M2、M27 都具有“墓坑四壁光滑”，“墓坑四邊設有熟土二層臺，二層臺面高與原椁蓋面高相等”，“葬式為仰身直肢，頭向東”，“棺內鋪有朱砂”等特點。以上這些葬制、葬式的重要指示作用絕不輸於一個小小的腰坑。所以，總體而言，葉家山 1 號墓與 M65、M2、M27 諸墓在葬制、葬式方面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

第二，要緊的是分析整片墓地的年代走向，墓與墓之間的早晚關係，看看什麼是這片墓地的主流文化。

簡報作者與參加筆談的諸位專家都認為 M1 早於其他墓葬，這是正確的。正因為 M1 的年代最早，離商代末年更近，也更容易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周承商制，商人慣用的日名、族徽、腰坑、殉人，為什麼就不能在周人那裏留下痕迹呢？

我們已經著文說到姬周貴族也偶爾使用日名，如召公家族銅器，但總共也不過十來件，比起幾百件不用日名的周人銅器來說，畢竟是極少數了。而且個別姬周貴族使用日名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即使用日名的時間很短，主要在成康之時；使用日名的層

〔1〕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第 272 頁，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2〕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 年第 8 期，第 11 頁。

面很窄,主要是周王(如武王)和大貴族(如召公一支);使用日名的地域偏東,這些日名銅器都出自原本殷商文化氛圍濃郁的地區。我們一再強調:“假若沒有一件姬周貴族的銅器上綴有日名,作為殷商時期非常重要的日名制度在周人身上竟沒有打下任何印記,那反而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失去了歷史的真實。”〔1〕同理,如果沒有一位姬周貴族使用腰坑,恐怕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只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商文化漸漸消退,漸漸融合到周文化中,所以 M65、M2、M27 就沒有腰坑與殉犬了。

M1 的墓室面積為 9.00 平方米, M2 的墓室面積為 14.26 平方米, M27 的墓室面積為 32.83 平方米, M65 的墓室面積為 17.57—18.17 平方米(墓口)、15.39—15.77 平方米(墓底)。相比之下, M1 的墓室面積偏小, 又缺乏有“曾侯”、“曾侯諫”字樣的銅器, 怎能代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文化內涵呢?

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什麼是占主流地位的銅器? 當然是鑄有“曾侯”、“曾侯諫”字樣的銅器。除了 M1, M2、M27、M65 都出土了“曾侯”、“曾侯諫”所作銅器, 而且以鼎、簋、甗為主, 顯示了周人重食文化的新潮流。意味深長的是, “曾侯”、“曾侯諫”所作銅器上均不見日名與族徽, 這又為“周人不用日名說”添一佳證。至於 M2、M27、M65 也出土不少有日名、族徽的銅器, 並不奇怪。因為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 銅器的來源十分複雜。譬如在寶鷄竹園溝 13 號墓中, 有父辛圓鼎、父辛分檔鼎、戈鼎、史父乙豆、覃父癸爵、父己壺、父辛盤等, 〔2〕有族徽、日名的銅器比沒有族徽、日名的銅器還要多, 這些族徽、日名銅器或來自贈送, 或來自掠奪, 也不排斥是兩種文化相融後的產物, 所以不能簡單根據族徽、日名銅器來判斷墓葬族屬。〔3〕 M2、M27、M65 出土的日名、族徽的銅器, 多數是酒器, 來自不同的國族, 很雜亂, 不代表墓葬的主流文化。

總而言之, 在判斷墓葬及其出土青銅器的族屬時, 要從葬制、器物的文化色彩和相關文字資料作統籌研究, 不可偏頗。

## 二、文化因素

對古文化遺存進行文化因素分析與族屬分析是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上面已經涉及文化因素分析, 簡報作者與參加筆談的專家也談了很好的意見, 本文擬做些補充

〔1〕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文博》2009 年第 3 期;《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第 25 頁。

〔2〕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強國墓地》第 50—68 頁。

〔3〕張懋鎔:《周原銅器族屬淺議》,待刊。

意見。

就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銅器而言，大致可分為商式與非商式兩種。那些日名、族徽銅器都是商式銅器，例如 M1 出土的師方鼎、父丁冉罍，M2 出土的父乙分襜鼎，M27 出土的守父乙觶，M65 出土的父己分襜鼎等。還有一些沒有日名、族徽的銅器也是商式銅器，例如 M1 出土的獸面紋簋，M27 出土的獸面紋圓鼎，M65 出土的扁足鼎，等等。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商式銅器要比周式銅器多。就在曾侯諫所作的方鼎、圓鼎、分襜鼎上，也可以看到濃郁的商文化色彩。對於西周早期墓葬，出土如此眾多的商式銅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能據此來判定墓葬的族屬。多數銅器的文化指向並不能決定墓葬的性質。在這裏，要特別關注那些非商式的銅器及其裝飾特點。

1. 方座簋：M27 出土疑父方座簋 1 件(M27: 17)。我們主張方座簋起源於陝西寶雞地區。<sup>〔1〕</sup> 經過統計，有出土地點的西周早期方座簋共有 38 件，陝西 20 件(其中寶雞 12 件，涇陽 2 件，長安 3 件，臨潼 1 件，白水 2 件)，河南洛陽 3 件，山東 5 件，北京 3 件，遼寧喀左 2 件，江蘇丹徒 1 件，湖北隨州 3 件，湖南株洲 1 件。資料表明方座簋主要出土於陝西的寶雞地區，而後一支向東，影響到當時的成周(河南的洛陽)，一支向北，影響到北京的燕國；至於山東地區出土的方座簋很可能不是從成周而來，因為整個豫東地區未見有方座簋，而是受到燕國的影響，因為著名的梁山七器(有太保方鼎、太保簋、太保鴟卣)就出在山東壽張。<sup>〔2〕</sup> 另一支沿漢水向東南發展，影響到兩湖地區，M27 出土疑父方座簋可以說是這種影響的結果。或以為方座簋起源於河南安陽，果真如此，為什麼安陽以南鄭州到武漢一線未見一件方座簋？僅從傳播路線看，也可佐證方座簋起源於寶雞。M27 是葉家山墓地迄今發現的最大一座墓葬，唯一的一件方座簋就出在這裏，可見曾侯對方座簋的重視程度。與曾國不遠的鄂國，出土兩件方座簋，加上傳世的鄂叔方座簋(集成 03574，方座內懸有小鈴鐺)，隨州成為南方出土方座簋最多的地方。這裏既有四耳方座簋(鄂叔方座簋)，也有雙耳方座簋(疑父方座簋)，形式多樣。

附帶說明一點，鄂國銅器中帶鑿的鄂侯弟曆季尊、觶，其文化因子可能也來自寶雞。任雪莉博士在《從寶雞新出亞共尊看西周特殊的具鑿銅器》一文中指出：甘青地區自馬家窑文化開始，具鑿陶器一直是這一區域器物的主要風格特點。寶雞竹園溝墓地 M1 曾出土了馬鞍罐和雙聯罐各一件，可見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辛店文化或

〔1〕張懋鎔：《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 年第 12 期；《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88—97 頁，科學出版社 2006 年。《再論西周方座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9)》第 10 頁，三秦出版社 2002 年；《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98—111 頁。《三論西周方座簋》，《蘇州文博》2011 年第 1 期。

〔2〕請參閱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 45 頁，中華書局 2004 年。

者寺窪文化對寶鷄地區的影響。寶鷄出土的兩件帶鑿尊(2012年3月寶鷄石嘴頭村出土的亞共尊及寶鷄竹園溝M4出土的強季尊)是受到了西北地區羌戎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寶鷄地區是這種形制獨特的具鑿銅器的一個重要起源地。風格漸趨成熟的單鑿尊後來有可能沿漢水進入湖北地區,這也就是鄂侯弟曆季尊、卣出現的原因了”。〔1〕我們贊同這種說法。

2. 蝸身獸紋(也叫蝸紋、捲體夔紋):疑父方座簋(M27:17)腹部裝飾蝸身獸紋,這是一種很有特點的紋飾。據任雪莉博士研究,蝸身獸紋只流行在西周早期武王至康王時期。〔2〕它的分佈也有一定規律,主要出現在陝西寶鷄、涇陽,甘肅靈臺、四川彭縣一帶。寶鷄有6件(其中竹園溝2件,戴家灣1件,岐山3件),涇陽高家堡戈國墓地5件,甘肅靈臺白草坡3件,四川彭縣竹瓦街5件,湖北隨州1件,遼寧喀左1件。這說明蝸紋最早的起源地有可能在陝西關中地區,而後影響到了甘肅、四川、湖北、遼寧等地。蝸身獸紋的起源、輻射及傳播路線與方座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方座簋上飾蝸身獸紋,特殊器型加上特殊紋飾,出現在葉家山曾國墓地,很值得尋味。

3. 乳丁紋:曾侯方鼎兩件(M27:23),形制、紋飾與作冊大方鼎(集成02758)相近,唯腹部所飾乳丁較長且頂端尖銳。這種又粗又長又尖的乳丁紋多出現在陝西關中西部。鄒衡先生將這類銅器認為是先周文化的器物。〔3〕當然這件曾侯方鼎上的乳丁紋的尖銳程度不及關中西部的器物,但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聯。特別之處還在於曾侯方鼎口沿下龍身上下所飾的小渦紋上各有呈梅花狀的5個小乳丁。這種裝飾較為少見,因此具有很強的指示作用。這種紋飾在涇陽高家堡戈國墓地M3、M4的方鼎上出現過。這種紋飾也見於葉家山墓地的另一件銅器——獸面紋小鼎:(M1:14),可見它在葉家山墓地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表明製作者對乳丁紋有一種細緻入微的觀察與特殊的興趣。

4. 獸面紋小鼎:(M1:14),通高16.2—16.4、口徑11.5、足高6.6釐米,重1180克。與天馬一曲村晉國墓地M6081出土的兩件南宮姬鼎有點相似。後者高16.4、口徑14.4釐米,重1025克。〔4〕區別在於前者有高領,上有獸頭與紋飾,後者無領,也無紋飾。朱鳳瀚先生懷疑它不是晉國器物。〔5〕更接近的器物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欠父乙銅鼎(集成01532),高15.4釐米(綜覽鼎270)。從M2出土的曾侯諫

〔1〕任雪莉:《從寶鷄新出亞共尊看西周特殊的具鑿銅器》,待刊。

〔2〕任雪莉:《蝸紋的主要特點及研究意義》,《寶鷄文理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第37頁。

〔3〕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316—317頁,文物出版社1980年。

〔4〕鄒衡主編:《天馬一曲村(1980—1989)》第336、342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5〕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作媿甗、簋來看，結合這件獸面紋小鼎的紋飾風格與曾侯方鼎有關聯，它有可能借鑒了北方媿氏家族銅器的形制與紋飾。

5. 銅劍一件(M1: 24)，與寶鷄竹園溝 M4: 55 劍接近。<sup>〔1〕</sup> 這種扁莖柳葉形劍，主要出土在陝西寶鷄竹園溝、茹家莊以及甘肅靈臺一帶。在河南洛陽、北京琉璃河、江蘇儀徵、湖南長沙也有發現。盧連成先生認為它在殷末周初發源於陝甘一帶，寶鷄地區是使用流行的中心地區。<sup>〔2〕</sup> 也有學者主張它發源於四川，譬如高大倫先生指出，“三星堆出土這種柳葉形劍當為目前所知同類型中最早者”，“應為蜀文化的典型器物”。<sup>〔3〕</sup> 當然，它也可能與來自西亞地區的扁莖劍有關聯。<sup>〔4〕</sup> 葉家山的扁莖柳葉形劍或者直接受到陝西寶鷄地區扁莖柳葉形劍的影響。

6. 龍形鉞(M65: 9)，通長 26.7 釐米，有二管狀鋇。這種形式的銅鉞通常叫作有鋇耳形鉞，它是西周新出現的鉞形制，數量很少。輪廓與中原的圓形玉鉞相似，但管鋇的設置則借鑒了北方長體有鋇刀的作風，可以看成是一種融合型的器物。<sup>〔5〕</sup> 甘肅靈臺白草坡 M1 出土一件虎形鉞，通長 23.1 釐米，有二穿。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 M27、M502 也分別出土一件虎形鉞，前者通長 23.5 釐米，後者殘長 18.5 釐米，但無穿，有二管狀鋇，更接近葉家山的龍形鉞。M27 的年代在春秋早期，但這件虎形鉞是西周早期的器物。據陳昭容先生考證，西周早期的芮國在今陝西與甘肅的交界處，離靈臺與寶鷄都不遠，<sup>〔6〕</sup> 它們之間的交流更多，相似之處也更多。長安張家坡 M170 也出土一件，<sup>〔7〕</sup> 可能受寶鷄的影響。有趣的是葉家山龍形鉞上的龍眼，與隨州羊子山出土鄂器上獨特的神面紋眼睛的形態一樣，說明曾國銅器也受到鄂國銅器的影響，這件龍形鉞是在當地製作的，是多元文化的結合。

7. 虎紋戈一件(M65: 70)，與寶鷄竹園溝 M19: 60 虎紋戈接近。<sup>〔8〕</sup> 以虎紋作為主要裝飾，是一種特徵比較明顯的兵器。這種虎紋戈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十餘件，形式多樣，有些銅戈從形制到紋飾幾乎與葉家山虎紋戈一致。<sup>〔9〕</sup>

〔1〕 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強國墓地》第 162 頁。

〔2〕 同上注，第 443—444 頁。

〔3〕 高大倫：《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與文物》1994 年第 2 期，第 84 頁。

〔4〕 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第 57—59 頁，文物出版社 2011 年。

〔5〕 韓金秋：《夏商西周時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9 年。

〔6〕 陳昭容：《談西周早期虞芮兩國位於千河流域的可能性》，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與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主辦“近二十年新出土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0 年。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第 168 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年。

〔8〕 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強國墓地》第 203 頁。

〔9〕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第 2 期，第 112—114 頁。

當然這種形制與紋飾的銅戈也可能來自巴蜀，或者葉家山虎紋戈受到來自陝甘交界一帶以及四川的雙重影響。

總而言之，無論從青銅禮器還是青銅兵器來看，西周早期的曾國銅器一方面受到商式銅器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與陝西周王畿地區的青銅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曾國銅器中，看不到像銅尖底罐那樣特色鮮明的強國銅器；同樣是在隨州，在曾國銅器中，也看不到裝飾神面紋那樣極有個性的鄂國銅器。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曾國是一個姬姓的諸侯國。

以上我們所舉例的所謂有特色的曾國銅器，也多是受到陝甘交界一帶青銅器的影響下的產物。由此可見曾國在銅器製作和禮制方面與周王朝保持經常性的交流，這或許是曾國得以長期存在的一個原因。而那個有點桀驁不馴的鄂國就很快被周人消滅了。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僅僅是依據已經發表的 4 座墓葬的資料來作判斷，結論未必妥當。葉家山的發掘還在進行之中，希望在將來有更多的發掘資料公佈之後，再來作研究。



(張懋鎔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